

乡村记忆

16岁 我走进牟平“工夫市”

李国全/口述 刘甲凡/整理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不知不觉间，又到了“麦黄三晌”的时节，一下子就想起了我68年前的一段打工经历。

1955年，我16岁，在本村小学念四年级。因为家里人口多房间少，晚上睡觉就到同学李树国家里去“拼大炕”，一块“拼大炕”的还有和我同岁的李国恒。

那还是“单干”时期，每年夏秋农忙时节，我们村的一些壮劳力，就会到牟平“工夫市”卖短工。当时正逢麦收季节，李树国的大哥哥每天都去卖短工拔麦子，晚上回来，他就给我们讲白天经历的那些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他每天能挣两块钱，还能吃上大饽饽、小米干饭、猪头肉、煎刀鱼这些好东西。每当听他讲起这些，我俩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家10口人，只有爷爷和叔叔他们这些壮劳力才能吃上苞米饼子和小米干饭。我和弟弟妹妹几个人，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顿好饭。大饽饽、猪头肉和煎刀鱼对我俩的诱惑力太大了，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也去工夫市卖短工，不光能挣点小钱买点学习用品，最主要的还是想吃上一顿大饽饽和煎刀鱼。

第二天鸡叫头遍我们就动身了，到了工夫市，天才麻麻亮。工夫市在牟平城东关柳林集那条街上（现在的酒厂街），那里是牟平人卖短工的集散地。由于是麦收的大忙季节，工夫市上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片人。需佣工的人来了，大伙就围上去，当面谈妥价钱和大致的活计，就相随着走了。太阳出来老高了，我和李国恒却始终没人搭理，都嫌我俩长得太瘦小了。

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我俩只得悻悻地动身往回走。等走到牟平城南沙庄村头的时候，被一位60多岁的老伯拦下了，当问清我俩是出来打工没人要时，就说如果愿意可到他家去干一天。大伯开出的条件是早饭吃大饽饽，中午小米干饭，晚饭喝白面汤，工钱是给我们两个人一块钱。想到能吃上大饽饽，我俩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到了老伯家，他说要我俩先推几趟粪到村头的地里，再吃饭。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小推车都是木头轱辘，不像胶轮那么有弹性，推起来格外吃力。我们两个16岁的孩子，又饿着肚子，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个推一个拉，好不容易才推了几趟。吃早饭了，等大饽饽和咸鲅鱼干上桌后，我俩的眼珠子都放光了，什么也不管不顾，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别看我们干活没多少力气，可正是“半桩小子赛头猪”的年纪，一会儿的工夫，每人一个砂碗口大小的饽饽就下肚了。老伯在一旁看着，不迭声地说我俩是“干活不济，饭量不小”。

吃过早饭，老伯先带着我俩到打谷场上，把前一天收的麦子摊开了，说是要趁着中午的好日头打麦场。这段活儿刚干完，老伯又招呼我们到村南的地里种玉米。他给我俩安排的活儿是用“二人抬（一种小农具，也叫耢子）”开沟，他们家的人跟在后面施粪、下种。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烤着，脚底下的土都有

点发烫了。我俩轮换着，一个在前面弓背弯腰拼命拉，一个在后面用肩头抵住杠把使劲往前顶，一会儿工夫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可到了这个份上，打退堂鼓是万万不行的，我俩就咬牙坚持着，总算把那半亩多地的玉米种上了。

刚要坐下喘口气，老伯就催我俩趁着太阳最毒这个当口去打麦场。也是看我俩确实累得不想干了，老伯就答应午饭让我们吃上猪头肉，这才让我俩又振奋起来。打场用的是带支杆的碌碡，我俩还是一个人扶着支杆，一个人拉着碌碡转圈。又忙活了好大一阵子，被飞扬的麦糠整得灰头土脸，才算是把这场麦子打了一遍。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伯没有食言，上桌的是小米干饭和汤菜，还有一碗大葱拌猪头肉。我俩自然又是猛吃一气，直吃到弯不下腰了才罢休。

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大伯让我俩把麦场上的麦草垛起来。在这之前，那个麦草垛已经有一人多高了，是前一天一个短工干的。干这种活我俩实在是“力巴头”，丁点技巧也不懂得，只知道一个劲地往上摞。等太阳落山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收了顶的麦草垛“呼啦啦”一下子倒了下来。

这一下老伯火了，厉声呵斥我俩是“文登县的轿夫子——能吃不能干”，说是如果今天不把草垛重新整好，不但不能吃晚饭，连工钱也不给。我俩急眼了，就找理由说是草垛原来打底就歪了，倒了也怨不得我们。双方越吵越激烈，老伯就用手推了一下李国恒，说是要我们赶快滚球。我眼瞅着李国恒顺势就四脚朝天倒下了，接着就大声哭喊着在地上打起滚来，说是他的腰跌坏了。他的哭喊声越来越大，鼻涕眼泪流下来，再用脏手抹一把，就活脱脱成了一张唱戏的大花脸。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老伯的邻居们都惊动出来了，男女老少有几十号人。看到这种情形，都劝老伯消消气，不要和两个孩子计较。李国恒这一招也实在是令老伯猝不及防，他一看再这样闹下去，就要被邻居们说三道四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自认倒霉，答应我俩工钱照付，晚饭照常喝白面汤，草垛的事也不用我们管了。这种情况下，李国恒被我踢了一脚，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不哭了。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他表演这套把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回，我们去南村老杨头家偷杏子，他被人家逮住了，为了脱身，用的也是这套把戏。

过了些日子，我俩卖短工这件糗事就在村里传扬开了。一时间，“一块钱俩”就成了大伙凑到一起唠嗑时的笑料。再往后，又变成了生产队上弱劳力的代名词。那些年，凡是小学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孩子，都被叫成“一块钱俩”的劳力，干一天活儿记5个工分。

现在想一想也真是可怜，两个16岁的孩子，为了5毛钱，为了吃一顿大饽饽和猪头肉，不但铆足力气干了一天，最后连“耍赖”的套路也用上了。再看看现在的孩子，16岁还没离开父母的掌心呢。

碾转

富周

碾转是麦子做的一种地方性的吃食。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说它有地域性是因为我只在河南吃过，其他地儿见都没见。

先聊聊这食物是如何做的吧。

夏初杏黄季节，在麦子接近成熟时，将由绿变黄的麦子齐穗掐下一大捧，上大锅蒸熟了，搓出麦粒儿，趁湿去石磨上推碾。倒进磨眼的麦粒儿在两片石磨上压下挤的作用下，呈细麻绳状落在磨槽里，当地百姓管这玩意儿叫碾转。

把碾转盛进碗里，拌上清早摘下的嫩黄瓜打出的丝儿，加盐、放蒜泥、倒水醋、点香油，爱吃麻酱的亦可和进一勺。搅调匀了，竹筷子夹一大口塞入嘴里，轻轻咀嚼，哇，浓郁的麦香和着淡淡青草的味道从嘴里直透鼻腔，让人仿佛一下子坠入到春天的气息里，那种香甜和暖的感觉实在美妙。

我品尝碾转是在河南的朋友家里，碾转是他的母亲做的。朋友称母亲为娘。起初，听他不把母亲叫妈而喊娘，我觉得土气。后来，吃过娘亲手做的碾转，与她挥手作别时，我不自觉地也叫了两声娘，说，娘，再见，有时间让俺兄弟带你来胶东，我给娘做海鲜。

那年是麦黄时节去河南的，出差10天，当地朋友请我下了三次饭店。每次都匆忙，家里有事的样子。问他，他摇头说，哥，恁放心，木（没）啥事。

临别那天上午，他打电话说，哥，俺娘出院啦，她让中午接恁上俺家吃饭。咱这儿有规矩，贵客来了不让进家不礼貌。一直没让恁来家，对不住哥啦。

我这才知道，这段时间朋友的母亲生病住院了。电话里我赶紧道歉。

中午，坐朋友的车去他老家，望见家门时，看到大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朋友说，那是咱娘。满脸慈祥的娘大病初愈的样子，让人心疼。

这天，主食是娘给俺们做的碾转。她说，麦穗是她早起去自家地里揪的，在灶间的大锅上蒸熟的，用大簸箕和搓板脱出的麦粒儿。娘说着，走向

院中的磨盘，朋友赶忙跟过去。娘拦他，说，恁陪恁哥说话，推磨有俺。

朋友哪能让娘干这活儿，他套上磨棍推碾转。娘拗不过儿子，儿子在前面推着磨，娘跟着儿子身后转着圈儿。

望着娘一忽儿的背影一忽儿的正面，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少年。

我出生在鲁中淄博，小时候家里的主食有一半是玉米面摊的煎饼。挺独特的是，那里的人们习惯把玉米面泡到发酵出微微的酸味再上磨去推成煎饼糊，摊出的煎饼叫“酸煎饼”。恼人的是，我打小不爱吃“酸煎饼”，而且，进了磨道抱上磨棍，闻见酸味，转不上三圈准恶心头晕。别人家的孩子能帮着大人推磨，我不行。不但不行，还要家里拿着玉米面去换大米给我吃。大米比玉米稀罕，要2斤换1斤。现在想来，在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我的母亲和父亲为了我的大米，他们是不是经常要往紧处刹裤腰带？

娘把做好的碾转盛出第一碗端给我，第二碗端给儿子，不再盛了。娘微微笑着看俺俩，嘴唇动动没说啥。我看看朋友，他看看我，俺俩也没说啥，同时埋头大口吃碗里的碾转。

娘亲手做的这碗碾转，第一口香郁口腔、沁人心肺；第二口感念亲情，让人流泪。我和朋友都红了眼圈，彼此都窥见，男人的难为情让我们抬头佯装看天。碰碰酒杯，来，喝！不知不觉喝下两瓶宋河粮液。娘在旁边瞅着，担心俺俩喝多，可嘴上啥也不说。

从河南回来，每到收麦季节都起念头，回老家给娘和爹做碗碾转让他们尝尝，总是有各种理由回不去。爹先于娘走了，他是吃不上了。再到了麦黄时节，又想，今年回家吧，找个石磨，抱着磨棍弄碗碾转给娘尝尝。想了4年，一次也没落实，开出的都是谎花，一个果儿也没坐。直到娘也走了，成为终生的遗憾。

当下又是吃碾转的季节，有条件的给父母做一碗吧，让爹娘享受一次新鲜，为日子增添一份乐趣，给生活留下一个记忆。